

消长新集

周木斋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消长新集

周木斋

序言

新文出版社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消长新集

周木斋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625印张 3 插页 162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书号：10368·137 定价：1.20元

缘 起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战争为止的十年间的文学，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并具有特殊的风貌。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随着上海政治环境的演变，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抗战初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上海是抗战前线之一翼，全国作家大多都在上海，这里成了全国文学运动的中心。文学作品类多激昂而率直。二、“孤岛”时期，即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上海四周虽已沦陷，却还有一小块租界成为当时的特殊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作家，以此弹丸之地为据点，采取种种灵活方式，继续与敌伪周旋。当

时的文风，仍多激越，但限于环境，表现手法已逐渐向迂回曲折和隐喻讽刺转变。三、沦陷时期，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一切出版物和文艺活动都要受到侵略者和汉奸的严密控制。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地下领导依然存在，坚持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效劳的爱国作家（包括文学上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家在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或用“商办”名义，继续编印书刊，或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有计划地打入敌伪文艺报刊，发表反映现实生活、培养读者严正艺术趣味的作品，排挤替敌人歌功颂德的毒草。这时的文坛，呐喊和投枪已不允许，而现实主义却有了进展，在艺术上经过了更多的锤炼。这类作品，今天看来也许会被指摘隐晦，甚至色调暗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需要经过种种斗争才得发表！就是这类作品，等候着作者的往往是逮捕和严刑，而的确有不少作家经过这样的炼狱，有的甚至惨遭杀害。

我们深感以上三个阶段文学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都值得保存下来，使后代知道：我国现代文学有过这么一个阶段，有过这么一批作家，他们曾在艰苦的岁月里，为我国的现

代文学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而流光易逝，岁月不居，这项整理工作至今还没有去做，大批资料仍然散佚，有待搜集，再不抢救，恐将荡然无存！

同人有鉴于此，集会商讨，决定承担起编纂《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责任。钩沉辑散，以这一时期上海的作家和作品为主，并兼收活动在上海附近的浙江、江苏、安徽、福建诸省，以至香港、南洋等地，而与上海仍有关联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剧本、儿童文学等各种体裁），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

本丛书成立编辑委员会，约请巴金同志为名誉主编，推举楼适夷、林淡秋、柯灵、朱雯同志为主编；具体编务，则由杨幼生、陈梦熊、管权、胡凌芝、萧斌如五位同志担任。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①。

担负工作的同志，各有自己的岗位，抽暇收集材料，走访求教，往往为寻找一种资料，费时数月，一有所获，则欢欣如得至宝。本丛书每册从选题定篇以至编辑出版，确也颇费了不少心力。展读当年作品，相隔已将近半个世纪，而当时斗争年代的各种情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篇章，依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这使

我们觉得从事这项工作并非毫无意义而告慰于心。

我们深感遗憾，主编之一林淡秋同志却未及看到“丛书”出版就溘然长逝了，谨在此表示我们的悼念。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三月

① 1985年起，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序

唐 弼

三十年代前期为《申报》副刊《自由谈》写评论性短文——即后来所谓“花边文学”的同道中，我和徐懋庸、周木斋、陈子展、曹聚仁四位较熟，说是较熟，也不过公开场合之外，偶尔有些私人过从而已。那时子展和聚仁已是上海滩上的名教授，一个在江湾复旦大学，一个在真如暨南大学，都要来去奔波。聚仁先生每星期还到亚尔培路（现在的陕西南路）回力球场消磨上一两个夜晚，自说要通过回力球赌博研究他的“适然史观”，不用说更忙了。

我是业余写作的，别有职业，每天在一定时间内去体力劳动，文艺界的会不能经常参加，有的朋友特地走上门来，将当前形势和会议内容告诉我。懋庸便是这样的朋友之一。而当他担任“左联”常委会秘书（即行政书记）以后，征求意见，布置工作，来往更见频繁。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我曾申请参加“左联”，鲁迅先生劝我暂时不必加入，但“左联”有什么事情，这之前或之后，我都一一照做。胡风、林淡秋、尹庚、石灵都找过我，但以徐懋庸次数为最多。懋庸每

次找我，同时也找木斋，我和木斋就在这样的场合相识，但从未问他是不是“左联”盟员。直到全国解放，木斋逝世已近二十年之后，有一次，徐懋庸告诉我：那时为了保存力量，遵照鲁迅意见，停止发展盟员，不然的话，他早已介绍木斋和我参加“左联”了。我才知道木斋也不是。

这样，除了徐懋庸（他当时还没有入党）代表“左联”同大家接触外，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是“左联”盟员，大家却一致支持进步刊物，撰写文艺杂感，意识到自己是在“左联”的影响下写作，没有想过因为不是“左联”成员，应当把这些工作放到左翼文艺运动之外去。举一个例，我们曾为《人间世》写稿，但当林语堂侈谈左翼青年腋下挟本马克思的什么书，高视阔步，目空一切，从而大加嘲笑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不约而同地都嗤之以鼻。这是很难用个人交情或者朋友私谊之类解释的，的确有一种力量支配着我们，什么力量呢？根据我个人的体会，那叫做：时代的感情。

总的方面我们的确很一致。

论个人关系，由于性格、阅历和地位的差异，各有各的表现，可又颇为不同了。正当丁玲、潘梓年失踪，杨杏佛被暗杀前后，国民党报刊纷纷造谣，一口咬定“左联”把住了《自由谈》，说曹聚仁经黎烈文介绍加入“左联”，陈子展和被捕释放的黄素合谋骗取稿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当时的上海，有人乐于传播这些，因为这是打破别人饭碗，找得自己靠山的进身符，比唐人的行卷还有效。教授原是美缺。据我所知，两位先生颇受到一些压力，不过对付

的办法不一样。陈先生的是要编者在文章的后面刊出“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骛，《蘧庐絮语》，就此完结。”一面宣告“完结”，一面换个笔名，另起炉灶，在《自由谈》等刊物上，继续写他声东击西、借古讽今的稿子。曹先生的不同。他在主编的《涛声》周刊上大叫大嚷，一会儿《敬告〈社会新闻〉》，一会儿“奉告《微言》记者”，说“我曹聚仁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未参加“知识分子的集团”，从来不做“走狗”和“奴才”，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虚无主义者”，要谣言家认明“乌鸦为记”，替他“切实更正”，否则的话，那就“法庭相见”，或者双方择个吉日“决斗”。

这使人想起堂·吉诃德，不过从此没有了下文。

说心里话，我是不大赞成曹先生的做法的。我以为这种事情可以不必声明，尤其不必向那些人去声明。孔子说过：“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我还以为，即使是可以与言的人，有些事情也不需要声明或解释。看曹先生的意思，无非以为自己确实没有加入“左联”，应当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不至再误传开去。其实问题何止一个“左联”！《涛声》多次发表《我们的态度》，在重要关头申述自己的主张，终至不得不说：“政府若是因循苟且，依旧那么妥协下去，我们决心站在最左翼，和政府处敌对的地位，死而有灵，为厉击人！”这是鲁迅说的“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总注脚。而且还的确采取不顾死活的态度，赤了膊一仗一仗打下去。

这类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政府赞同“国际合作”，《涛声》则说这是“共管”，是“引虎拒狼”；政府提出“非武装区域”，《涛声》则说这和瓦仰安提人卸下武装一样，意在向敌人表示：“我远离了自卫思想，完全相信你的宽仁”；蒋介石引退，宋子文和汪精卫互让行政院长，《涛声》引《韩非子》的话说：“禹传天下于益，而实命启自取之。”不顾君子风度，竟作诛心之论。至于上海市政府取缔反帝会议，《涛声》却欢迎反帝代表，还刊出了马莱爵士的演讲词；北平市党部宣布民权保障同盟非法，《涛声》却登载同盟消息，还详细报道了杨杏佛被刺的经过；政府抬举胡适，《涛声》却接二连三的批判他；政府通缉鲁迅，《涛声》却表示拥戴和赞扬。白纸黑字，昭然在目，难道发一通牢骚，说几句气话，就能说明得了、澄清得了的吗？诚然，曹聚仁先生没有加入“左联”，但是《涛声》写重头文章的，还有黄芝冈、陈子展、曹礼吾、鲁迅、周木斋、彭家煌、魏猛克、李儼、杜谈、杨霁云……等，那就不能说统统没有加入“左联”了。可见问题不在曹先生声明的那一点。

讲了许多《涛声》的事情，好象离题，其实并不，因为刊物上那些“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包括我提到的在内，有许多出于木斋的手笔。他原是《涛声》的作者，《自由谈》受到压力以后，木斋写得更加勤奋。同样是“赤膊打仗”的文章，他不学陈子展摇身一变，也没有曹聚仁发扬踔厉，却只是冷眼旁观，以深刻的观察和严密的逻辑，对准要害，猛地一击，然后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逐点分

析，使对方腾挪不得。他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曹先生的声明多此一举。但他没有直接提出，而是在自己的文章里，用了更多的历史观点，更多的辩证法，打起仗来，虽赤膊而仍极沉着。听说《涛声》创刊之初，几个人深感寂寞，想喊几声，便办了这个刊物。有人提出叫《涛声》，有人根据同样的含义主张用《海的叹息》。我对木斋说：曹聚仁写的是《涛声》的文章，而你的，应当发表在《海的叹息》上。虽然“涛声”就是“海的叹息”，但我觉得，在生活情趣上，两者实在太不一样了。

木斋凝望着我，点点头，不说什么。

我们习惯于说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浑然无间的高度的结合。尽管还不是什么定义，我看这样说是可以的。不过，既然是两种成分的结合，那就很难象医生配方一样，硬性规定这个和那个的比例。十分自然，有时诗的成分多一点，有时政论的成分多一点，因人而异，而在每个人的杂文中，又不免因篇而异，不可能完全一律。四十年代初有人评论木斋，说他应当是“思想家”而不是“文艺家”，把他的短文当作文艺性杂文是“一种历史的误解”，因为他用的只是哲学语言。这样说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杂文的形式多种多样，简单地套上一个公式——或者因为政治的成分多了便说它不是文艺杂感，或者因为诗的成分多了而指为“文化主义”，我以为这对杂文的发展没有好处。木斋的杂文比较倾向于说理，理性超过感性，确是这样；但说他写的只是政论，往往“不自觉的停止在政论的前面”，这是不公道的。

木斋自说他执笔时的意图是：“在写作的时候，总是想只要把因有所感而把理说出来，便算于愿已足，重质，而不计文，实在有点野气。”难得的是这点“野气”使文章和“政论”区分开来。毫无疑问，木斋的态度是严肃的，正经的，他不在政治上大喊大叫，只是安详地解剖，耐心地分析，使理论具有诗的灵魂。例如上面提到的宋子文和汪精卫互让行政院长，他借韩非“禹传天下于益，而实命启自取之”这句话，直刺蒋介石，一针见血，余味无穷，值得细细吟味与咀嚼。禹的故事本身就是形象，就是诗。收在本书里的《差一点儿》、《“压宝”观止》、《阿Q相》、《逢恶》、《算命看相者流》、《凌迟》、《“民逼官反”》、《乡原和董·吉诃德》、《关于滥用名词》以及他自己喜欢的三篇《影痕》，都有类似的内蕴和特点，都是绝妙的杂文。如果人们在木斋的笔底听到了海的怒吼，那么，他们也将听到另一种声音——海的叹息，这些正是时代的涛声。

当然，杂文之外，木斋还有他别的重要业绩在。我曾读到的就有《中国民族革命小史》、《新中国发展史》、《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等著作，后两种更为重要。《新中国发展史》叙述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史有进步、有挫折、但却始终向前发展的面貌；《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溯到太平天国时期，辩证地写出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变化，提出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的确难得的。但综木斋的一生，短短三十二年中，除了编辑工作，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杂文上，他是《自由谈》、《太白》、《新语

林》、《涛声》、《芒种》、《世纪风》、《鲁迅风》、《浅草》、《海风》的中坚，在他主编的《火炬》、《晨钟》上积极提倡杂文；支持“鲁迅风”杂文的有他，提出“重振杂文”的是他。谈中国现代杂文而不涉及周木斋，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木斋兼编《大晚报》副刊《火炬》的时候，主要是约别人写杂文，自己写得并不多；主编《导报》副刊《晨钟》的时候，稍稍写了一点，主要仍然是约别人写。恽逸群几乎每天一篇。在我的印象中，他以旺盛的心力从事杂文写作，主要可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一九三四年到三五年之间，特别是《太白》、《人间世》同时行世，在所谓“小品文年”、“杂志年”那段时间里，他写得很多，从容开阔，无所不谈，而以反对日本侵略，鞭挞不抵抗主义为主。后一个阶段便是这上海沦为“孤岛”时期，围绕《世纪风》、《鲁迅风》等刊物，千言万语，直接间接，几乎都是为民族解放战争而呕心沥血，献出其知识、才干、精力，以至于最后的生命。他无愧于是这个伟大民族的伟大的儿子。

这本集子是卢豫冬同志代为编集的。豫冬是木斋的好友，又是一般书店的同事，不，同道。木斋写《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豫冬写了《中国抗战军事发展史》，都是皇皇巨著。骈肩作战，莫逆于心。为这本书写序，豫冬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却一定要我执笔。想起当年友好，日益凋零，而木斋是最初离开我们的一个，我心里确有一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情，然而要“言”，又如何“言”得尽呢？木斋说

过：“人总应该有信仰的，我也有那信仰，而且我的慈脾气使我深信不疑，……”现在，木斋的信仰已在祖国的大地上实现，如果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的责任。木斋！作为你的朋友，我们将在斗争中时时想起你，时时想起你，……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唐 强 1

边鼓编

差一点儿	3
关于“转变”	4
刺字赞	7
讳败	9
“向无偷银三百两之意”	11
今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意义	12
“压宝”观止	16
幻灭	18
“纳粹”	20
不要做中间的弱者和强者	22
妾命薄	24
两种血	26
活傀儡的嘴脸	28
“好戏”原来如此	30

日本“七七”纪念文告“联珠”	33
头重脚轻	36
鸿雁	38
阿Q相	39
无烟的火	41
相反相成	43
索还总血债	45
制裁罪魁祸首	47

横眉编

坐实	51
“具有历史意义”	54
逢恶	56
算命看相者流	58
卖弄	60
男盗女娼	61
“谁会笑的，谁最后笑”	63
裁刀	65
飞渡	67
“固有精神”	69
望火止寒	72
需要批判论争	74
乐观和悲观	76
游击战的杂感	78